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统制经济的态度嬗变

洪富忠

【摘要】全面抗战期间,国民党为积聚人力、物力、财力以应对战争之需,不断强化对经济的渗透与管制,逐渐形成以统制经济为特征的战时经济。中共对战时统制经济的态度是支持中有批评、反对中有赞同。在抗战初期,中共主张大力发展国防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随着统制经济力度的加强,国家资本逐渐膨胀,私人资本发展空间日渐萎缩,中共呼吁节制国家资本,发展私人资本;到抗战后期,尤其是豫湘桂战役后,中共呼吁取消统制经济,争取政治民主。中共对统制经济的态度既受其作为工农利益代表的政党底色、国共关系演变的影响,也与统制经济实行过程中的流弊等诸多因素有关。中共有关统制经济的考察,丰富了对抗战时期统制经济理论的观察维度,也为中共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治理水平提供了历史借鉴。

【关键词】中共;全面抗战时期;统制经济;《新华日报》

【作者简介】洪富忠,历史学博士,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福州),2024.2.133~14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资助项目“中国共产党在国共论争中的政治话语建构及历史经验研究(1937-1945)”(21BDJ084)。

七七事变后,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打破了中国经济的运行轨迹。国民党为积聚人力、物力、财力以应对战时所需,不断强化对经济领域的渗透与管控,逐步建立起以统制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战时经济。学界关于战时统制经济的研究,既有对战时统制经济的整体研究,^①也有侧重于战时统制经济与贸易关系的研究,^②还有对近年学界统制经济史研究概况的梳理。^③揆诸已有研究,学界对战时统制经济的形成过程、具体成效,以及具体行

业、典型人物、特定区域等问题均有较深入的研究,但对中共如何看待战时统制经济却鲜有着墨。本文拟对此问题展开探讨,以期加深对战时统制经济的认识。

一、“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战时统制经济的形成

统制经济不仅是20世纪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也是当时诸多国家实际运行的经济制度。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萧条标志着古典自由主义的

终结,以美国“罗斯福新政”为主要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大行其道,统制经济思潮受到各国推崇。这一思潮也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关注。统制经济理论因与集权思想有吻合之处,受到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政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更成为国民党战时经济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何谓统制经济?战时国内学术界多有分歧。有学者将其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广义的统制经济,包含两种不同的方式:一为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一为统制经济(Economic Planning)。狭义的统制经济仅指后者而言”。广义的统制经济是“现代风行一时的经济制度”。^④其将当时世界上英、法、美、德、意、日等国的经济制度称之为统制经济,实际上是基于对这些国家经济形态的概括。还有学者在分析战争对社会运行造成重大影响的情况下,认为必须实行战时统制经济,“战时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统制经济”,是“以资本主义最高形态的独占组织及其支配下的产业为中心,改编全国各种生产组织,故金融资本独裁之发展程度,是战时统制经济的尺度。反转来说,战时统制经济,也强力地促进国家资本主义之完成”。^⑤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统制经济既不是苏联计划模式下的统制经济形态,也不是英美式的统制经济形态;国民党的战时统制经济某种程度上并不完全具备成熟经济体制的特征,而更多的是在战争的特殊状态下,国家强力介入国民经济领域,汲取战争所需的各种资源,维持战争所需并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由于现代战争的巨大破坏性及其不同于传统战争的特点,在大规模战争状态下,各国都程度不一地加强了对国民经济运行的介入。有学者认为,战争打破了和平时期的平

衡,统制经济的实行有其必然性,故“战时经济统制就成了国家总动员的枢纽”。^⑥

国民党战时统制经济政策是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而逐渐形成并不断强化的。自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至七七事变前,国内虽有国共之间的内战或新军阀之间的混战,但新军阀之间的混战持续时间相对较短,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又多在几省交界的偏远地带,对全国经济运行的影响相对有限。七七事变后,日本从南北两个方向发动全面进攻,中国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中心不断沦陷,对中国经济尤其是工业经济几乎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国民党不得不组织部分厂矿企业内迁,以维系抗战。同时,国民党对经济运行管理机构也进行了一定调整,尤其加强了军委会对经济的干预,但由于事起仓促,事先并无详细的谋划,此时更多是从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过渡,体系完整的战时统制经济尚未建立。

1938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是国民党对七七事变以来由平时转向战时时局的一次系统总结与谋划。会议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提出了“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为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⑦决议案就农村经济、战时税制、银行业务、交通整理、市场管理等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会议还通过了《战时土地政策草案》《非常时期经济方案》等议案。这是国民党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首次对战时经济发展提出明确的纲领,尤其是以军事为中心的“计划经济”方针的提出,迈出了向战时统制经济过渡的重要一步。计划经济虽不能简单等同于统制经济,但实际上已经有了统制经济的内涵。

武汉沦陷后,抗战进入最为艰辛的相持阶

段。此时在中国东南沿海及华北的经济重镇,几乎所有的工业中心、经济中心都被日伪占领,中国经济面临严峻形势。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在开幕词中指出,“现在战争起因往往在经济的掠夺,而成败胜负也往往以经济能否持久为决定的因素”,为此,全会决定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以统一党政军之指挥”。在经济建设方面,会议提出“实行统制经济,调节物质之生产消费,举凡抗战必需之重工业、矿业,民生日用必需之轻工业、手工业,急要之铁道、航空线、公路等,应竭力之所能,努力兴举。更以巩固币制,流畅金融,促公私产业之发展,其他如农、林、畜、牧之改进,内地蕴藏之开发,后方各省生产能力之增加,尤当合政府人民一切资本技术之力,切实加紧推行”。^⑧这是国民党首次提出实行“统制经济”。此后,国民党制定一系列关于工、矿、农、商、金融、外汇、粮食、棉花等行业或领域的统制措施,统制经济措施开始全面推行。

随着持久战的深入,日本加大了对中国国际交通线的打击,企图截断中国外援的输入。滇越铁路、滇缅公路的相继中断,使外来援助进入中国愈加困难,至1941年前后,中国抗战进入最为困难的时期。1941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决定“调整财政收支系统,将全国田赋统一于中央整理,以为实施建国大纲及本党土地政策之基本,并决定今后当努力推行粮食管理与各种人民生活必需主要物品之公卖,及统制经济政策,以期均衡人民生活需要之分配”。^⑨为此,会议制定了《积极动员人力物力财力确立战时经济体系案》,内容共有十条。^⑩为配套相关纲领内容,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了11项相关经济决议案。该案的制定及其配套措施的推行,是国民党向战

时统制经济体系转型的重大步骤。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届九中全会,会议决定加强四个方面的举措:一为“厉行基层建设,树立民治基础”;二为“加强经济管制,保障国民生活”,“对于军需物资之生产与运输,力求其增进;对于民生必需品之分配与供应,严密其管理;对于物价工价之平定,囤积居奇之取缔,与粮食之供应管制,尤必严格执行,以安定军民之生活”;三为“实施土地政策,发挥土地效用”;四为“加强实施动员,发挥战时人力物力”。^⑪会议还通过了《加强国家总动员实施纲领案》,制定国家总动员实施纲领。1942年3月29日,国民政府制定并公布《国家总动员法》,规定自本年5月5日起正式施行。上述举措,表明国民党战时统制经济的完全建立并不断强化。1944年,随着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场上的溃败,大后方的经济、政治等各方面情况进一步恶化,国民党在美国的帮助下设立战时生产局,进一步加强了对经济的全面统制。

国民党的统制经济政策随着抗战进程的推进而不断强化并最终形成。在战争这一特殊背景下,对经济进行统制是各国较为通行的做法,本身无可厚非,国民党的战时统制经济集聚了大量人力物力,对争取抗战胜利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作为战时国内两大政治力量之一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统制经济持何种态度,尤其值得关注。

二、“创立由政府统制的强大的国防军需工业”:中共对加强经济统制的支持

抗日战争打断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常进程,使本已落后的中国经济更为困难,促使国民党当局改变经济政策。战时经济必须服务于抗战,为

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发展由政府统制的国防经济。1938年1月28日,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翁文灏认为经济建设方针应“从内地中心做起,为国防、民生而建设,工矿并举,农工并重”。^⑫《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表示赞同,认为“经济建设必须适合抗战的需要,首先必须努力建立军事工业”,同时应动员广大民众参与,注意改善人民的生活。^⑬战争对军事工业提出了更高要求,“战时的经济建设的最重要和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建立强大的国防军需工业!这是当前经济建设的中心枢纽与中心链环”。为此,《新华日报》认为要从七个方面着手,通过采取这些措施,“我们才能创立由政府统制的强大的国防军需工业!才能够达到战时经济建设的根本课题——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⑭从《新华日报》的评论来看,中共此时对国民党加强经济统制^⑮并无异议——民族存亡之际,“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义之打倒,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基础”。^⑯同时,《新华日报》还认为,在东南沿海城市被攻占以后,发展国防经济的重点应该转移到大后方,不仅要在西南建设,还要在西北建设;为满足前线战斗需要,首先以建立“国防工业为第一重要”;完善西南西北国际路线,解决军火零件及原料的运输问题;扩大国际宣传,争取国际援助,利用他们的财力物力及技术,支持中国建设国防工业。^⑰此外,《新华日报》还认为工业方面“要注意中国重工业资源是极度贫弱的”,农业方面则要大力扩充“国内粮食生产”,“禁止毒物生产及减少畸形的商品作物生产”。^⑱

发展由政府统制的国防经济,必须实行新的战时经济政策。面对日军的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在进行军事抵抗的同时,对经济政策及相关机构均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战争需要。七七

事变后,国民政府决定由资源委员会负责工厂内迁,1937年8月30日,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总动员计划大纲》,在财政、金融方面提出一系列措施,如“改进旧税,变更稽征办法,维持国有收入”“举办新税,另辟战时特别财源”“发行救国公债,奖励国内人民及海外华侨尽力购买,指充战费”等。^⑲1938年3月底,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提出“推进农业生产”“发展工矿以应供需”“筹办工垦以安难民”“发展交通便利运输”“分别地区调剂金融”“管理贸易以裕外汇”“厉行节约以省物力”。^⑳国民政府还对经济机构进行一系列调整,以应对战争需要。与之相应,1938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战时新的财政经济政策主要目的是“以保障抗日武装部队一切必要供给,满足人民必需品的要求,并和敌人的经济封锁与经济破坏做斗争”,具体政策包括工业、农业、私人工商业、税收、公债捐助、敌伪经济斗争、薪酬制度、借贷、交通等方面。^㉑

发展国防经济需要政府加强统制经济,但不能因此忽视广大民众的生活。中共认为,发展国防经济与发展民生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矛盾。改善人民生活往往意味着特定阶层要部分放权让利,可能有损于小群体的私人利益,但却能够激发民众的生产热情,从而有利于建立真正的国防经济,有利于抗战。社会上部分人“拘于狭隘的阶层利益,极力反对在抗战期间改善民生,认为既云一致对外,即不应有改善民生之要求”。针对此种错误观点,《新华日报》指出,“中国广大工农及贫民大众因受到重重剥削,大都陷于饥寒交迫的境地”,要正确处理抗战与改善民生的关系,“这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国家民族之利益,自应大于阶

级或个人之利益,全国人民必当以国家民族之利益为共同之目的,即使平日因其地位或其职业利害感情各有不同,然覆巢之下断无完卵,惟有向共同之目的而共同迈进,乃可以救国家救民族,且即以自救。故抗战期中,一切经济的设施,必须以争取战争的胜利为目标,而要使抗战得到胜利,必须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几万万工农贫民大众的过重负担加以解除,减轻他们的痛苦,改善他们的生活,以便更切实的增强民族的抗战力量,同时亦可减少各阶级间相互的冲突和磨擦”。^②

国民党在各种场合也宣称以军事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但实际改善程度有限。战时经济出现困难是极端情况下的必然现象,但国民党经济政策的偏颇及其执行中的走样,致使经济困难进一步加剧,以物价上涨为主要表现的经济状况更趋恶化,从而招致包括中共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批评。在1939年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产销不符,物价高涨”^③是大会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12月,经济部公布《取缔囤积日用品办法》及《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办法》,但效果欠佳。1940年12月10日,《新华日报》发表评论,对全国抗战以来的经济情况进行分析,尤其对粮价上涨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指出“一个革命的经济政策必须确定而且立即实施”。^④国民党方面针对粮价上涨,多以战争时期不可避免为由进行解释;《新华日报》则认为,“这是一种武断的说法”。《新华日报》以英国为例,说明战争并不必然导致物价暴涨,有许多方法可以缓解,如“妥善处理通货问题”“严格取缔囤积居奇”“改善经济机构与管理方针”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改善当前的财政经济政策与行政机构”。^⑤

发展国防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必须高度重视

政治动员工作。政治动员是中共的优良传统和一贯优势。《新华日报》指出,“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的实际困难,主要的恐怕还在于政治动员的不够与经济机构的不健全。抗战到了今日,一部分有资产的同胞还不能真正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还没有真正做到有钱出钱的原则,以致新的战时经济财政政策还不能推行无阻。而一些发国难财者又藉端舞弊操纵黑市,抬高物价。这无疑的还需要有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工作,加以政府的制裁或舆论的制裁”。^⑥可以看出,中共特别注意政治动员对于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以确保战时经济财政政策能顺利推进。“广泛开展生产运动,一方面要促进国防经济建设,努力提高工业农业的生产力,激发工人农民以及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热忱。另一方面,它是群众运动,应发动各级党、政、军及各群众团体中的全部工作人员,积极参加生产运动。”^⑦李富春在论及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时也指出:“我们的生产运动,不仅动员已经从事生产的人民,而且特别动员一切脱离生产的人员,在基本上不妨碍战斗、工作与学习的原则下,号召与组织各机关各学校各部队的全体人员,以‘劳工神圣’的精神从事必要的劳动。”^⑧《新华日报》认为,提高工人生产热忱的关键“首先是加强政治教育,使工友们对于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有深切的认识”。^⑨

战争状态下加强对经济领域的管控力度是国家应对战争的必然选择。抗战初期中共对国民党加强统制经济在总体上持肯定的态度,并为此献计献策,呼吁加强管理,重视民众动员,大力发展国防经济。囿于各种原因,国民党战时经济政策在制定与实施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战时经济始终存在诸多问题,引起社会不满。而东南沿海富

庶地区的沦陷更使国家经济大伤元气:1938年“国府控制下之各地,进口货减少82%”,“出口货减少52%”,“被占领区域,进口货增多192%”,“出口货增多133%”。^③国民党虽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效果非常有限。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强烈要求改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1939年7月,《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指出:“在军事工业的建设上,已计划多端,但经济各部门之配合,财政上之保障,交通上之转运,技术上之提高,都未能集中全力,使之告成”,“对国防经济建设,不着眼于配合抗战,不着眼于分区生产,不着眼于紧急需要,致令计划虽有,实施甚微,去抗战之需要实远。更有投机者,在抗战中犹复利用权位,从事倒把,于是资金外流,法币跌价,生产停滞,物价增高,此不能不影响抗战之持久,尤不能不障碍全面战争之发动”。^④

三、“断不可因为增强国家企业之故,便置民营事业于不顾”:中共对国家资本侵蚀私人资本的批评

随着国民党统制政策的加强,加之长期战争的影响,国家资本有日益侵蚀私人资本发展空间的趋向。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国家资本在金融业的垄断地位就已经形成,全面抗战爆发后其垄断地位进一步加强。尤其是1939年10月国民党改组了“四行联合办事总处”,逐渐形成以“四行二局”为中心的战时金融垄断体制,国家资本银行的存款从1938年的40亿增加到1943年的417亿,由占本国银行存款总数的77.7%增加到90%。^⑤如此巨额的存款大多用于利润更高的商业投机,而对工矿企业的放款却大幅缩减。据统计,1939年重庆有15家银钱业,“商业放款,在全部放款中,有的则占百分之八十九强,有的则占百分之九十

七强,有的则占百分之四十七强,有的则占百分之四十一,有的则占百分之六十四强。工矿两业的放款,有的则不足百分之一,有的则占百分之二十七强,有的则占百分之十强”。^⑥尽管各家银行比例不一,但商业放款比例远超工矿放款的趋势非常明显。国家资本以金融业垄断为开端,依靠国家权力逐渐扩散到其他领域,如资源委员会拥有的工矿企业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十余个,到1941年,“它支配的企业突增至78个,1945年更增加到128个”。^⑦国家资本在抗战期间得到快速扩张,“战争使政府成为最主要的经济企业家”。^⑧

战争期间必须加强国家资本的发展,但也要给予私人资本一定空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认为:“除纯粹国防性质之工业,应由官办外,其余一般工业,最好能参加政府或国家资本,以立下监督统制工业之基础。”^⑨孙中山所倡导的民生主义主张“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中共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毛泽东指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⑩至于“平均地权”,在当时的环境下,中共并不主张没收地主土地,而是采取地主减租减息的政策。虽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提及在适当的时候要采取某种办法没收地主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但那是将来的目标,而非战时的。因此,中共对于国家控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并没有过多批评,而是着重强调要妥善处理国家资本与民营资本之间的关系,

认为在中国经济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国家资本不能过于庞大,应该给民营经济留下适当的发展空间。

1943年全国生产会议召开前夕,《新华日报》就如何处理国营企业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关系发表社论:“国家经营的企业,年来颇有进展。从煤铁、冶炼、机械、水泥、酒精、火柴、棉织以至面粉,国家资本皆占相当的数量。国营厂矿所具的条件远较私人资本为优越。国家资本越扩大,私人资本就会越减少其存在的机会,何况管制是一天比一天加甚呢?”“关于生产的经营方式,显然应走节制资本的道路,凡有独占性的企业,应归国家经营。但是,这个过程断非‘一蹴而就’的。在抗战的时候,要提高生产,只管发扬国家资本仍是不够的,因为公营企业的产量比私营企业来得少,还不足以供应客观的需要;到了建国的时候,私人资本亦仍有发展的余地。因为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要进行开发,单靠国家资本的力量还是不够的。就是把国家资本扩大百十倍,也还有很多地方,还有很多部门,需要民间资本去开发!”中共主张:“在抗战的今日,一面应调整国营民营企业的关系;一面还要尽量扶植民族资本的发展。过度的干涉,是有损民族产业的元气的。在抗战以后,还不禁止私人资本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薄弱的原故。因此,后方的私人企业,在战后是仍有发展的余地的。”^⑧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仅仅依靠国家资本远远不够,需要私人资本的补充,二者之间不应该是简单的此消彼长关系,而应协调发展,如评论所指出的“断不可因为增强国家企业之故,便置民营事业于不顾”。^⑨

针对关于发展私人资本的疑虑,中共认为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而非限制私人资本。“关心

社会经济性质的人,总以私人资本之发展为虑,因而极力主张发展国家资本。在原则上,我们极端赞成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节制资本政策,但在实施这个原则的时候,必须从发展与联系的见地去措理。今天后方的国家资本诚然比私人资本(指产业而言)大了二倍多,但以生产量而言,仍然远落在客观要求之后。而民营的工厂与矿山,其规模更比战前小了很多倍。环顾后方各省状况,都是中小生产占着极大的比重。生产规模的薄弱,要求我们扩大产业资本,要求我们设法鼓励人民向产业投资;要鼓励人民投资,自不宜限制太多。而中小生产占优势的事实,就明明白白告诉我们,限制是限制不了的。为了发展生产,似宜多致力于鼓励,少致力于限制”,“这是当前产业问题的焦点”。中共赞同业界“必先‘有’,而后方可言‘管’,必须先‘够’,而后方可才能言‘制’”^⑩的观点,认为当局应该根据战时经济发展的需要,给予私人资本更大的支持而非限制。

节制国家资本、发展私人资本,就必须反对官僚资本。这里需要先厘清两个概念:国家资本与官僚资本。国家资本,顾名思义是以国家的名义管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也可称之为国营资本,其受益对象是全体民众,而非少数的个别。官僚资本的概念是在抗战中后期才开始在中共话语体系中出现的,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将官僚资本认定为“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⑪中共认为,以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为代表的国家资本必须是服务于整个国家及民众的资本,是靠私人资本自身无法完成国家建设的资本,不能服务于极少数人。如果极少数人以国家资本的名义服务于少数人,那就不是国家资本,而是官僚资本。1943年中共在抗战

六周年纪念宣言中指出,“经济改革的基本方针,我们认为应该是为着发展生产,而实行一个调节各阶级经济利益的民主集中的经济政策”,其中之一即为“保护中小工业的生产,使之不受官僚资本与投机商业的打击”。^④可见,官僚资本虽与国家资本不同,但在近代中国特殊国情里,二者存在紧密的联系,官僚资本极易以国家资本名义出现,并使国家资本成为官僚资本的代名词和护身符。

在战时的特殊条件下,国家资本是国民党实施统制经济的必然结果,且受其政权性质影响容易蜕变为官僚资本。中共并不是泛泛表示反对国家资本,而是要求国民党的国家资本不能成为少数人所控制并为少数人牟利的官僚资本,希望国家资本与民营资本形成相互支撑的良性关系。

四、“民主是发展生产的暖室”:中共对取消统制经济的呼吁

统制经济是大多数战时国家都采取的经济模式,但其成效受多种因素制约。首先,统制经济的推行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如“真正统一的政府”“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行政制度先要彻底的现代化”。^⑤就这三个条件来看,国民党还有相当差距。按照曾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的说法,蒋介石“事实上仅仅是一般乌合之众的首领而已”,“他常常难以保证推行自己的命令”。有资料指出,“1944年,国民党政府能够支配调拨的用于维持政府运作的产品,只占全国产品总值的3%”。^⑥其次,吏治情况关乎政策执行效果,而国民党的吏治不仅被社会人士所批评,就连国民党自己也感到不堪。马寅初就指出,国民党的统制经济“是一种公私不分之统制”,“其误国之罪,远在奸商汉奸之上”。^⑦1942年的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上,“赖澁痛责中央大员贪污枉法,颓唐因

循”。^⑧1944年9月5日的参政会开幕式上,参政员林虎指出,“中央地方各地之贪污现象,未能尽法惩治,为抗战建国时期之大患”。^⑨蒋介石对此也很清楚,其在1945年6月宴请浙、沪代表时就表示浙江“军政之腐败恶劣,无以为怀”。^⑩再次,战局也对统制经济的社会观感造成重大影响。1944年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场上失败后,大后方经济一落千丈,民生凋敝。吏治腐败叠加战局艰辛,无疑大大加深了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危机,“是一场灭顶之灾”。^⑪行政院高级公务员陈克文感叹,通货膨胀使得“公务员及其他恃薪俸为生的人,真到了山穷水尽之势”。^⑫公务员尚且如此,普通百姓更是苦不堪言,整个时局已“病入沉痾”。^⑬1944年10月25日,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局势起了很大的变化,从今年四五月间到现在变化就更大。国民党反共,抗战不积极,贪污腐化,没有一点希望了,政治、军事、经济都没有希望了。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人民都仰望着我们。”^⑭为此,中共强烈呼吁取消经济统制政策,推动政治民主。

抗战后期国民党统制政策进一步加强,对各行各业的限制趋多,加之战场失利,社会衰败百业凋敝,引起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要求废除战时经济统制政策的呼声日渐高涨。《新华日报》发表大量文章,报道经济统制所造成的困难。有论者以花纱布行业为例,说明“愈管制,军用就愈成问题”,且产生了“托辣斯的倾向”,要求“顾全生产,取消花纱布管制”。^⑮国家资本与民营企业争利,威胁民营商业,造成诸多行业陷于困境。^⑯大后方生产萎缩不堪,棉纱丝绸各业纷纷减产停工,煤矿机器化工等业日趋萧条,当局只强调是物价上涨所致,而对更改经济统制政策“毫不重视”。^⑰“不

论重工业,不论轻工业,大家都希望不要再管制下去了”,独占统制的路线“只有把后方经济引导到一条死路”。^⑤《新华日报》指出,“统购统销是独占垄断的护符,是官僚机关舞弊营私的最好的工具”,“统购统销是必须废除的,其他一切独占统治的办法亦必须取消”。^⑥1944年7月,《解放日报》曾转引《大学月刊》的文章指出,“金融之统制,交通之统制,贸易之统制,物价之统制,直到重要的物资之统制,皆经先后实行,然仅事统制,而不积极开发,工农矿生产不但不会有新的发展,其将不堪负担,终必枯竭”。^⑦社会乱象丛生成为中共呼吁取消经济统制的社会基础。

中共认为,要解决经济困难就必须取消经济统制政策。1941年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后,中共发表评论指出,国民党的“所谓经济统制,否认经济的自由发展,以打击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及广大小资产阶级。此种错误的经济政策如不改变,则今日所发展着的经济危机即无法克服,那是很明显的”。^⑧中共认为该政策是“引向绝路的政策,绝对不能摆脱目前的危机”,其病源在于“少数大资产阶级分子与大官僚分子,垄断一切财政经济命脉”。^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进一步加强经济管制。1944年,中共在发布七七纪念口号时指出,“要求国民政府废除统制经济,取缔投机操纵与囤积居奇,实行发展农业生产,奖励民营工商业,克服经济危机,培养抗战的经济基础”。^⑩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期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公开呼吁“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⑪

中共在呼吁取消经济统制的同时,还呼吁加强经济民主。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指出,“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

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⑫有论者指出,“现代民主与现代工业,本是一对双生子。历史上自有现代工业存在,也就同时有现代民主的迅速产生;有了现代民主的民主政治,而现代工业才则由此得到保障,得到发展”,“中国的工业,要由古老的方式走上现代化,要由衰落的境地变为繁荣,也的确确是只有实行民主,实行民主才是工业自救之道,才是打开目前工业困境的一把钥匙”。^⑬《新华日报》发表马寅初在重庆星五聚餐会上的演讲全文,以“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概括其演讲主题,借此表明中共不仅在政治上主张建立联合政府以促进政治民主化,而且在经济上也主张必须以民主经济相配套,才能实现全方位的真正民主。^⑭工业作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现代工业没有经济民主就没有真正的工业化。

经济民主不仅是工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战时经济问题的重要方法。有论者指出,“民主是发展生产的暖室”,“经济上的民主是解决当前这个纽结的最基本的途径”。^⑮“工人与生产如果不能以民主的方式结合起来,生产的积极性固然无法提高,工作效率无法改进,如果工业生产者和政府管理机构,不能以民主的方式和衷共济以求进步,工业生产亦无由改善。”^⑯“只有给工人以民主,他们才能发挥其反法西斯侵略的伟大作用,才能提高其对于国家生产事业的积极性。”“我们以为给与工人以民主权利乃是今日一个最切实最迫切的问题。工人的民主权利,除了集会、结社、言论等自由以外,还应在经济生活方面给以切实的保障。”^⑰许涤新指出,“所谓用民主原则措置经济问题,就是经济民主的问题”,“国内如果没有经济民主,国民经济的命脉如果握在少数金融寡头

之手,则在国内必定酿成大众赤贫少数人暴富的局面”。国家经济要发展,以中国辽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雄厚的人力,单靠国家资本是不够的,要实行经济民主,使国家资本与民间资本相互推进,即“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应有适当的配合”。^⑥通过经济民主,能够最大限度调动生产者的政治觉悟并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从而有助于解决战时经济困难。正如《新华日报》所指出的:“不解除束缚,生产是没法发展的。生产要发展,经济就要民主,这还能再延迟吗?”^⑦

要实现经济民主,就必须实现政治民主。在中共强力呼吁政治民主的背景下,经济民主并不仅仅是一个解决经济问题本身的局部问题,其核心是以经济民主推动政治民主。1944年《解放日报》在纪念抗战七周年的社论中指出:“今日大后方与正面战场,一切问题之症结是在于民主问题与团结问题,一切危机之根源是在缺乏民主与团结不足。”^⑧面对国营事业的困难,人的因素很重要,“人的条件要以政治民主化为前提。民主政治可以刷清官僚作风,可以吸收各方人才”,因而政治民主化是解决国营事业困难“最根本的一点”。^⑨在诸多呼吁经济民主的报道中,最后的落脚点都在于政治民主,“政治生活的民主乃是经济改善的大前提”。^⑩

针对社会上将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相分离的错误舆论倾向,中共强调经济民主的根本在于政治民主。1942年许涤新发表文章指出,解决经济问题的核心在于“政治问题上的改善”。^⑪在工业化问题上,“倘若只是为了工业化的前途,在目前就必须首先认真取缔官僚资本,放弃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对于民间工业给以切实有效的帮助,在农村土地问题上实行一些必要而可能的改

革。——这些都还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但在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完成这些事情的。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展开中国的工业化的坦途;只有在独立自由的新中国中,工业才能照顾到广大人民的利益并繁荣地发展”。^⑫针对经济界提出的一些联合自救的办法,《新华日报》认为,“经济与政治是分不开的。要解决产业的困难,就必须以民主政治做前提,作保障。现在横在后方工业生产的问题,正是如此。因此,后方工矿界人士,应将眼光突出经济界的领域,去注意政治,去认识政治,并推动政治走上民主宪政的大道”。^⑬对于商业危机的解决办法,《新华日报》指出:“单纯地开一下金融之门以资救济,亦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在奖励生产,改善兵民生活,提高人民购买力,正确的扶助工商业的发展,及限制垄断投机的政策下,才能作合理的解决。但是,政治如果不民主,则上述政策亦就会成为纸上空谈了。”^⑭有人指出,民主政治“正是一把总的钥匙,可以解决一切重要的问题,是目前唯一的出路,因而也是全国人民所迫切坚决要求的東西”,“说目前的经济问题就是民主问题,也未皆不可”。^⑮中共还以物价问题为例,说明物价问题的解决虽有多种方法,但归根结底还是在于政治民主,政治是“今日一切问题的关键”,要解决物价问题,“只有实施民主,才能实现”。^⑯

豫湘桂战役后,大后方人心思变,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成为此时政治生活的主题。中共以政治民主统领经济民主,以经济民主推动政治民主,进而对国民党统制经济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这是形势使然。《新华日报》指出:“政治不民主,就没法使战局着实好转,亦就没法使经济界发展其事业,举目一望,窒息战时经济的措施实在太多了。所谓

统制,只能给与正当工商以无限的困难。”^⑧因此,经济问题的解决不能离开政治问题,正如时论指出,民主政治与民主经济密不可分,“有了民主经济,才能使民主政治有牢固的基础”,“只有在民主政治的实施前提下,实现民主经济”。^⑨民主成为解决战时各种危机的根本办法。

结语

纵观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国民党统制经济的态度嬗变,其基本的基调是支持中有批评、反对中有赞同,并非简单的或“支持”或“反对”的两极态度。其态度演变的脉络是初期支持多于批评,后期批评多于肯定。究其原因,既有国民党统制经济自身存在的问题,也与中共的政党底色及国共关系的演变有关。对于国民党的战时统制经济,中共是建言者、批评者、借鉴者,从中共的视角加以考察无疑会深化相关认识。

囿于战时中国的政治格局,中共对统制经济政策的实际参与极为有限,但其对统制经济的大量评论,加深了全党对统制经济的理解,也为中共加强自身建设及提高治理能力提供了借鉴。中共关于统制经济的系列公开报道评论,是以对相关经济问题的深入考察为基础的,而不是简单的批评指责,必须要有充分的说服力。在国统区工作过的胡绳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写批判性的文章,特别是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写这类文章,不能不注意到充分地讲道理。盛气凌人地骂人固然是不行的,单纯依靠引用一些马列主义的词句也是不行的”,“必须认真地讲出一些道理来,说明为什么从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如果只引用一些马列著作的词句,不但根本不可能驳倒被批者,也不能说服读者”。^⑩要以理服人,中共就必须不断

加强对经济工作的研究,尤其是对工业、金融业、城市商业等在中共根据地相对缺乏的经济领域的研究。以许涤新、华岗、石西民等为代表的中共人士,身处大后方核心区域,能够亲身体会和感知统制经济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1943年,许涤新在《战时经济政策的检讨》一文中,就对以“管制为核心”的战时经济政策进行了全面分析并提出建议。^⑪对战时统制经济的分析是中共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丰富了对战时统制经济的解读。另一方面,国民党在统制经济推行过程中出现的“上层有党下层无,都市有党乡村无,为私有党为公无”,“议论多,方案多,机构多,障碍多”,^⑫以及吏治腐败、国家资本与民营资本失衡等问题,也让中共引以为戒,使其对地大、人多、国弱的中国在强敌入侵时应如何取得战争的胜利有更深入思考,这对中共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均有重要借鉴意义。

注释:

①陈雷:《国民政府战时统制经济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②郑会欣:《国民政府战时统制经济与贸易研究(1937-194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

③丁留宝:《近三十年来统制经济史研究综述》,《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④何炳贤、侯厚吉:《世界统制经济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页。

⑤卢勋编:《战争与经济》,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60页。

⑥谭振民编著:《战时统制经济》,正中书局1940年版,第50页。

⑦《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1938年4月1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6页。

⑧《开会词》(1939年1月21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37、548页。

⑨《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宣言》(1941年4月2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75页。

⑩《积极动员人力物力财力确立战时经济体系案》(1941年4月2日),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3-44页。

⑪《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宣言》(1941年12月23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735页。

⑫李学通等整理:《翁文灏日记》(上),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14页。

⑬《厉行国防经济政策》(短评),《新华日报》1938年1月28日,第3版。

⑭《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社论),《新华日报》1938年1月30日,第1版。

⑮战时中共文献中,“经济统制”与“统制经济”的表述均有出现,使用“经济统制”的频率相对较多,正式文献中也有“统制经济”的表述,二者在内涵上并无根本的区别。

⑯《张闻天、毛泽东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成后宣传内容给周恩来等的电报》(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6页。

⑰《开发后方与建立国防工业》(社论),《新华日报》1938年11月26日,第1版。

⑱石西民:《战时经济建设问题》,《群众》1938年第9期。

⑲《国民政府总动员计划大纲关于财政金融实施方案》(1937年8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

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2页。

⑳《非常时期经济方案》(1938年3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㉑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17-618页。

㉒《抗战与改善民生》(社论),《新华日报》1938年4月5日,第1版。

㉓李学通等整理:《翁文灏日记》(上),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07页。

㉔《改进目前的经济政策》(社论),《新华日报》1940年12月10日,第1版。

㉕《急速制止物价再涨》(社论),《新华日报》1941年11月6日,第1版。

㉖《努力发展抗战时期的经济力量》(社论),《新华日报》1939年3月9日,第1版。

㉗《广泛开展生产运动》(社论),《新中华报》1938年12月20日,第1版。

㉘李富春:《生产运动》(代论),《新中华报》1939年3月3日,第1版。

㉙《提高工人生产热忱底关键》(社论),《新华日报》1940年7月16日,第1版。

㉚李学通等整理:《翁文灏日记》(上),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28页。

㉛《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6、447页。

㉜《上海金融史话》编写组编:《上海金融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58页。

㉝康永仁:《重庆的银行》,《四川经济季刊》1944年第3期。

⑭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854页。

⑮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刘敬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96页。

⑯《战时经济问题与经济政策》(1937年),《王亚南全集》编纂委员会编:《王亚南全集》第6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05页。

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

⑱《后方产业界的光明前途》(社论),《新华日报》1943年4月18日,第2版。

⑲许涤新:《当前经济问题的症结在哪里?》,《群众》1942年第19期。

⑳《发展产业的关键》(社论),《新华日报》1943年5月30日,第2版。

㉑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6页。

㉒毛泽东:《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1943年7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44页。

㉓丁文江:《实行统制经济制度的条件》,《国闻周报》1934年第27期。

㉔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王建朗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页。

㉕马寅初:《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1940年7月),徐汤莘、朱正直编选:《马寅初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7-188页。

㉖李学通等整理:《翁文灏日记》(下),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861页。

㉗王子壮:《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9册,“中研院”近代史所(台北)2001年版,第358页。

㉘王正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1册,“国史馆”(台北)2011年版,第31页。

㉙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

(1937-1949)》,王建朗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㉚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02页。

㉛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459页。

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版·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3页。

㉝胡休:《论花纱布管制之失败及其托辣斯倾向》,《新华日报》1945年7月17日,第3版。

㉞《碾米业困难重重》,《新华日报》1945年4月12日,第3版。

㉟统制政策结果如此,大后方生产萎缩不堪》,《新华日报》1945年7月10日,第2版。

㊱涤新:《不要再管制下去了!》,《新华日报》1945年7月22日,第2版。

㊲《废止统购统销》(社论),《新华日报》1945年1月23日,第2版。

㊳《大后方舆论十题》(三)《反对官僚资本垄断独占》(上),《解放日报》1944年7月18日,第3版。

㊴《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八中全会宣言及蒋介石演词的评论》(1941年4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7页。

㊵《延安经济学者评国民党经济政策之错误》,《新中华报》1941年4月24日,第1版。

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抗战七周年纪念口号》,《解放日报》1944年7月6日,第1版。

㊷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4页。

㊸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184页。

㊹昆吾:《发展工业须先实现民主》,《新华日报》1944年11月27日,第2版。

⑤马寅初：《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新华日报》1945年2月8日，第2、3版。

⑥《民主是发展生产的暖室》(社论)，《新华日报》1944年1月4日，第2版。

⑦本报记者：《新工业的苗床——一位工业家的谈话》，《新华日报》1944年1月1日，第5版。

⑧《工人需要民主》(社论)，《新华日报》1944年2月7日，第2版。

⑨许涤新：《不虞匮乏的自由——论用民主方式措置经济问题》，《新华日报》1945年3月4日，第2版。

⑩《从战局谈经济》(社论)，《新华日报》1944年7月10日，第2版。

⑪《在民主与团结的基础上，加强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纪念抗战七周年》(社论)，《解放日报》1944年7月7日，第1版。

⑫《论国营事业》(社论)，《新华日报》1944年2月28日，第2版。

⑬《工人需要民主》(社论)，《新华日报》1944年2月7日，第2版。

⑭许涤新：《当前经济问题的症结在哪里？》，《群众》1942年第19期。

⑮《工业化的道路》(社论)，《新华日报》1945年5月24日，第2版。

⑯《工业界努力的方向》(社论)，《新华日报》1944年4月21日，第2版。

⑰《论商业危机》(社论)，《新华日报》1944年12月30日，第2版。

⑱龙季子：《要解决经济危机必须民主》，《新华日报》1945年1月22日，第3版。

⑲李夫：《怎样解决物价问题》，《新华日报》1945年3月5日，第3版。

⑳《经济界需要民主》(社论)，《新华日报》1944年12月26日，第2版。

㉑李夫：《民主经济》，《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6日，第3版。

㉒胡绳：《漫谈自学经验及其他》(1982年12月)，《胡绳文集(1979-199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93、494页。

㉓许涤新：《战时经济政策的检讨》，《群众》1943年第1-2期合刊。

㉔李学通等整理：《翁文灏日记》(下)，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857、858页。